

宋代题名与题名记考论： 缘起、新变和审美价值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宋代题名记是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为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体文。宋代题名记承载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功能,如强调吏治、重视教化等。同时又往往于严密的记事之外表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或形容曲尽而委婉从容,或情融于事而平易自然,或借题发挥而说理透彻,其审美价值亦不可忽视。

[关键词] 题名;题名记;宋代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章编号]** 1002-3054(2016)02-0070-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kxy.bjshkx.160210

题名,即题记姓名,本文所论“题名”,特指中国古代文人将姓名题写于石壁或板壁的文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本材料。宋代题名之风盛行,清末叶昌炽曾云:“故题名不必求古刻,考其纪年,两宋为多,即唐贤亦不过百一。”^[1](P500)]在此基础上,宋代出现了“题名记”这一特殊文体。据《全宋文》检索,宋代现存的题名多达1142则,而题名记也有288篇之多,其中北宋82篇,南宋206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又据叶昌炽云:“南宋光尧后,士大夫渡江而南,临安为六飞所止,江、皖不啻左右辅。即闽、蜀、楚、粤之区,或请祠归隐,或出守左迁,林壑徜徉,自题岁月,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1](P499)]可见,南宋题名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游观题材尤为可观,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然而学界对宋代题名及题名记的研究却极为鲜见,以笔者之陋,论著仅曾枣庄先生《宋文通论》第二十一章《宋代杂记文》“建筑物记”中有所讨论。^[2](P717)]论文也只梅华《宋代题名记的传承与发展》、^[3]王星等人《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王晚霞《周敦颐石刻题名考述》^[4]等数篇。其中梅华文从

文体角度讨论了题名记的源流、形式和功能,对于宋代题名记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但是,作者将题名记与厅壁记混为一谈,忽视了题名记与题名的关系,仍有可以商榷的空间。另外,题名和题名记作为“文之一体”,^[5](P146)]其价值除了梅文所总结的“微言大义”之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一、记事要素加入,题名文体形成

题名行为出现的确切时间虽然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东汉时期题名就已经颇为流行。仅欧阳修《集古录》就收有《后汉孔宙碑阴题名》《后汉杨震碑阴题名》《后汉碑阴题名》《后汉杨君碑阴题名》《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后汉文翁学生题名》等11种。题名的大规模出现当在唐代,尤其是新进士的“雁塔题名”更有推波助澜之功。然而,早期的题名仅仅题写姓名,至多在姓名之前加上身份、郡里。比如《后汉杨震碑阴题名》“直云‘河间贾伯谿、博陵刘显祖’,凡百九十人者皆然”,^[6](P38)]虽然记录了一百九十人,但并没有任何叙述性文字。再如唐代著名的“进士题名”,一般也都只题姓名,至多

[收稿日期] 2015-06-08

[作者简介] 王晓骊(1970-),女,江苏苏州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095)

加上籍贯（郡望）：“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7]（P4）}“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8]（P2208）}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前言》中曾指出，“文体”指称的是“文本的话语体系和结构体式”，^{[9]（P2）}也就是说，完整而独立的话语体系是文体形成的基本条件。从这一意义而言，这些只题写了姓名、身份和籍贯的题名是无法纳入文体的讨论范围的。

然而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却专列“题名”一体：“按题名者，纪识登览寻访之岁月与其同游之人也。其叙事欲简而赡，其秉笔欲健而严……亦文之一体也。”^{[5]（P146）}细究其语，徐氏将之纳入文体范围，并不在于“纪识”，而在于“叙事”。可见，叙事（记事）要素的加入是题名成为文体的关键环节。

以题名记事的情况在唐代就已存在，如现存《雁塔题名帖》有这样一则：“五人郑知章、董季之、董居中、董从直、郑武，元和十年□月十七日同登更上。从此第三层西北梁上见颜鲁公任校书时手札，题名居中。”^[10]又韩愈《洛北惠林寺题名》《嵩山天封宫题名》《华岳题名》等，在题写姓名之外，都有相对较为完整的记事，如其《嵩山天封宫题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与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仝，自洛中至少室，谒李微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归。明日，遂与李、卢、道士韦濬、僧荣并少室而东，抵众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禅坛下石室。遂自龙泉寺钓龙潭水。遇雷。明日，观启母石。入此观，与道士赵玄遇乃归。闰月三日，国子博士韩愈题。^{[11]（P732）}

作者不仅记登览之岁月，录同游之姓名，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游览的路线和经历，这在宋代以前的题名中极为少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说“独《昌黎集》中有之”。^{[5]（P146）}可见，题名兼记事的情况在唐代并不多见，严格地说，记事只能算是题名原初形态的衍生物。

然而，从《全宋文》所录题名来看，“姓名（字、号）+记事”“官职+姓名（字）+记事”“郡里+姓名（字）+记事”构成了两千余则题名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除了姓名之外，记事已经成为题名的另一基本形式要素。我们可以因

此确定，发展到宋代，题名已经从单纯的题字留名演化为具有完整意义形态和话语结构的文本，也就是说具有了独立成文的文体基础。

记事要素的广泛加入，使宋代题名开始形成繁简不同的风格，其中既有“到此一游”式的极简记事，如杨蟠《题名》：“提点坑冶铸钱杨蟠公济，元丰元年二月三日游此”；^{[12]（第48册P245）}也有相对较为完整的记事，如孙固《汝州梁县秦悼王坟题名》，^{[12]（第48册P312）}记为宗室陈国公赵宗儒营葬事，不仅有时间、地点和参与人物，而且记载了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有首有尾，其记事功能已经非常完备。在记事的基础上，有些题名开始出现更为具体的描写，甚至借题名而兴感，这种形式的题名已经基本脱离其原初形态，几乎可以看作“记”体散文的一种。但是与一般记体散文有两点不同：一是篇幅较短，一般仅百字左右；二是文中必须包含姓名，有的还详细地列出了题名者的官职，事实上是把题名包含在记叙之中。如：

至和乙未岁，予为举子，过零陵，陪太守柳侯拱辰祷雨，因至澹山岩，于今廿三年，始得再游。其间绝景胜致，当日赏爱之处，仿佛如旧。观石间题名，缅怀柳侯，久为异物，使人惘然不能自己。熙宁丁巳清明前二日，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会稽赵扬题，永州军事判官、衡阳黄镇同来。（黄镇《澹山岩题名》）^{[12]（第48册P230）}

至和二年岁次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酿报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树堪倚。郡守陈求古率通判王希颜、邑令孙奕、台幕陈确、从事赵颉、杜仁寿会于岩石之上，醉书以记。（陈求古《飞霞洞题名》）^{[12]（第48册P286）}

或回忆旧游，怀念故人；或描摹景色，抒发情感，虽寥寥数语，亦不乏妙笔。尤其是后一篇，新酿佳果、清泉芳树，醉饮而归，其乐可知。文人逸兴，令人神往。虽然题写姓名仍然是其基本功能，但很明显，宋人题名已经具有记事的文体自觉了。

二、宋代题名记兴起，政教功能加强

随着记事要素的不断加强，宋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杂记体文，即题名记。与一般的记体文相

比,题名记属于题名的补充文本,即以题名为核心的补充记叙文字,着重于记载题名产生的背景、经过和目的,题名本身可以包含于其中,也可以独立题写或刻石。从文体起源来看,题名记这种形式在宋代以前就已存在,如唐代“郎官石柱题名”另有陈九言撰前记,许孟容撰后序,另刻于碑,这实际上与宋代的题名记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对题名勒石始末的记载和补充说明。但是“题名记”这一文体名称则至北宋才出现。景德三年(1006),马亮作《建康郡守题名记序》云:“余忝守郡条,职参史氏,故为题名记,欲使往者来者,得以显其名位、到罢月日,庶几乎千载之下,知皇宋之有人焉。”^[12](第7册P105)这应是最早关于“题名记”的记载。严格而言,“题名”与“题名记”是有区别的,但宋人于两者时有混用。有以“题名记”为“题名”者,如宋代黄贲《海陵郡佐题名记》:“近世凡贤公卿大夫出而为郡县者,率书前政之名氏,树之治事之堂,曰‘题名记’。”^[12](第70册P211)所谓“书前政之名氏”,明显就是“题名”。也有名为“题名”而实为“题名记”的,如陆济《全州厅壁后题名》,全文近300字,文中并未题写任何姓名:“……守厅旧有记,悉著前人名氏,更易者众,纪志已尽,不可复书。杨侯惧其无传,乃命龕石置诸壁以继之,且以待夫后之贤者,复俾济题其始立之岁月。”^[12](第76册P145)所题写的姓名应当是另外“龕石置诸壁”的,这篇文章则可以看作为题名所作之“记”。

另外,唐代“厅壁记”与宋代“题名记”也有着很深的渊源,甚至可以视为“题名记”的前身。刘宽夫在《汴州纠曹厅壁记》中说:“夫公署有记,其来自远,灿名氏于屋壁,示成败于将来。”^[13](第8册P7649)这与题名记以题名为核心作记的形式是完全符合的。实际上宋代“厅壁记”(含“厅记”和“壁记”)仍大量存在,《全宋文》共收228则。这些厅壁记中的大多数题写于官署墙壁之上,记录历任官员的名氏和事状,这无疑与题名记功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所以有学者认为题名记就是厅壁记。^[3]有的厅壁记的确保留了题名的功能,如刘公仪《合州厅壁记》、朱熹《漳州教授厅壁记》、吴泳《德清县厅壁记》等,都为壁上题名所作,完全可以视为题名记。但是也有

的厅壁记不承担题写姓名的职能,如王禹偁《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长洲县令厅记》是作者在任上有所感而作;黄震《抚州临川县主学厅记》是为了表彰临川县主学胡继张而作,与题名无涉。同时,题名记的范围也远不止于官署题名,还有游观题名、造像题名、登科题名等,其题写之处也可以是风景名胜、寺院道观或者私人宅第,题写的载体未必仅限于官署之厅壁。综上,题名记与厅壁记在内容和功能上虽然存在一定的交叉,但题名记的核心是“题名”行为,而厅壁记则强调其题写的载体,两者并不完全重合。可以认为题名记是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为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文体。

唐代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认为厅壁记产生的初衷是代替史官记事:“古者国有史氏,君举必书……秦以来国化为郡,史官废职,策牍之制寝灭,记事者但用名氏岁月书于公堂,而《春秋》《桼机》存乎屋壁,其来旧矣。”^[13](第4册P3951)这一功能设置仍然保存在宋代题名记中,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看,宋代题名记的史学价值又远远超出了“用名氏岁月书于公堂”的简单记载。有的题名记记载了当地行政区划之设置及变迁,如韩膺胄《太平州知州题名记》对太平州设置的时间、命名和所辖区域均有明确记录;有的则记载职官制度之嬗递,如王执中《小学教授题名记》详载诸王府教授官制的演变;有的记载了两宋武学的发展概况,如袁燮《武学登科题名记》、袁甫《武学经远斋题名记》等,是研究宋代武学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同时,不可否认,唐代厅壁记有溢美饰非的功能,而宋人对于这种扬己谀人的动机颇为不屑。如刘公仪《合州厅壁记》云:“昔元道州尝病自作记者则媚己,为人作者则媚人”;^[12](第48册P200)韩膺胄《太平州知州题名记》也说:“唐吕温乃谓壁记非古,何哉?岂非疾当时所纪虚为缘饰乎?”^[12](第158册P95)因此,宋人题名记往往更重视规鉴劝导的政教功能。

一方面,由于官署题名在宋代的普及,强调吏治成为题名记的首要职能。如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

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12]（第56册P232）}

刻谏官之名于谏院，使后人可指名而论忠奸。题名记的这一功能在南宋更为普遍，正如韩膺胄《太平州知州题名记》所云：“本朝内自三省百司，外自监司州县皆有题名记，非独以记岁月到罢，亦所以稽其人之贤否，考绩用之若何，揆他日之迁陟，后来者得以鉴观。”^{[12]（第158册P95）}宋代题名记的规鉴作用并不仅限于行政官员，也包括了学官。宋代官学教授的选任制度虽屡有改变，但士大夫阶层对这一群体非常看重，始终将之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依托。如南宋王谦之《州学教授题名记》就强调学官之置，所任为重，“夫培植涵养于平居未用之时，将凭藉扶持，以为子孙数百世之用，则所谓教者，岂特月书季考而已哉”？^{[12]（第290册P189）}然而，教授的失职行为也屡有发生。如政和三年（1114）正月，大臣上奏说：“教授入学，堕而弗处，有未尝升堂者，往往止托逐经学谕撰成口义，传之诸斋，抄录上簿而已，未尝亲措一辞于其间，至于本斋轮流复讲，则未尝过而问焉。”^{[14]（P2196）}大部分官学教授题名记都有提醒和戒示教授的作用，如邹浩《颖学题名记》：“……异日必有按子之所载以指而议者，曰‘某人如此，可以为法’，曰‘某人如此，可以为戒’。日月逝矣，其得失是非炳炳耳目中，犹足以动来者之心”；^{[12]（第131册P329）}周必大《赣州州学教授题名记》题写赣州自绍圣年间学官李朴以下教授姓名，特以表李朴“正身以率下，传道以解惑”之德，则有寄望于后来教官见贤思齐之意。^{[12]（第231册P222）}

另一方面，宋代题名记尤其是登科题名记承担着劝学的社会教化作用。登科题名，即唐代的进士题名。不过，唐代进士题名是由新进士发起的民间行为，而宋代进士题名则多由地方官员发起，题写或题刻于各州县地方。如谢谔《临江军进士题名记》、郭份《道州进士题名记》、朱熹《建昌军进士题名记》、文天祥《衡州耒阳县进士题名记》等。有的地方登科题名也以“雁塔”为名，如李梦铃《南平军学雁塔题名记》，表示沿袭唐代慈恩题名故事之意。这种地方性的登科题名无疑有记录地方盛事之意，但更注重对后来者的劝学作用，“郡有学，学有进士题名

记，易地皆然也”，^{[12]（第352册P296）}其用意无非“重之以示劝也”。^{[12]（第334册P405）}比如赵抃《睦州学进士登科题名记》：

（睦州）第无虚榜，数十年间，以今较昔，得人为三倍伙。是以知学之废兴在人，士之进退由学，盛时之明劝也。然士之所谓学，诚心竭力，企古圣贤道，将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于朝，仰首信眉，掌握当世务，与夺非是，出呼吸间，一率以正。然后尽臣子忠义之分，称人君敦勉之意。唇吻小巧，剜章刻句而已乎！因萃前后登第者名诸石，后来继焉。^{[12]（第41册P276）}

宋代还出现了家族性的登科题名，如俞榘《俞氏释褐题名记》题写的就是俞氏家族登科者的姓名，以警勉族人，益振家声。除了劝学，有的登科题名（记）也寄予了警示之意，如蔡杭《登科续题名记》：“诸君今日既仕之后，益当自勉于学问，以培植气节之根本。……后之人历指其名而数之曰：‘是人也，始于正，终于正；是人也，始于正，终于邪。’可不惧哉！”进士登科是学子踏上仕途的起点，时任江东提刑的蔡杭担心他们“富贵饵于前，患难怵于后，志昏于气，义夺于利，鲜有不易正为邪而失其素履者”，^{[12]（第335册P107页）}所以为此记以戒之。

三、题名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

作为一种杂记文，题名记虽以记事为主，但往往与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随事而发，因人而异，显示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使题名记获得了作为文学文本存在的审美价值。

有的题名记长于写景，形容曲尽而自出新意。在宋代游观之风的带动下，游观题名和题名记大量产生，后者更朝着游记的方向发展。如韦诰《绵州富乐山桃源洞题名记》、衡规《福严院题名记》、黄庭坚《石门寺题名记》（二则）、陈渊《甘露寺题名记》等，都有文字清丽可喜的特点，颇似后代的游记小品文。而秦观的《龙井题名记》则可视为游观题名记之翘楚：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来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

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上，皆寂不闻人声，道傍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12](第120册P129)}

这篇题名记实际上就是夜游龙井的小型游记。从记叙的角度而言，整个游览过程路线明确，有条不紊，所以苏轼有“闭目想之，了然可数”之叹。^{[12](第90册P437)}作者描写月下山岭之景，着重于创造清幽深邃的意境，让人油然而生“殆非人间有也”的超然情怀。而与好友策杖夜行，濯足清流，据石酌泉，又增添了浓厚的文人雅兴。其风格从容纾徐，语言自然雅洁，有让人回味无穷的情韵。再比如孔武仲《信安公园亭题名记》以唐之曲江、汉之昆明、洛阳之曲水、镐京之灵沼来衬托金明池“继前王之美而有之”的特点，^{[12](第100册P316)}虽不作正面描写，却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想象空间，不失为一篇别具匠心的写景散文。南宋魏熊梦《澹山岩题名记》，记事清晰有理，而且写景也很有特色，“裁数武，冷气逼人，宾主皆蒙夹衣以入，有衣衲者。足踏云根，苍翠四发，神剌鬼刻，非复人意所料。呈奇炫怪，领览不暇。龙井在左，胷有潜灵。凄神寒骨，冰雪入怀，益深益异而益凛然也”，^{[12](第297册P204)}从游人的体感出发描写山中景色，颇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有的题名记情融于事而平易自然。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五曾如此描写题名产生的背景：“登彼西山，岷首留名之想；送君南浦，河梁赠别之言；或萧寺笺纱，续僧寮之佳句；或苔床拂褥，记仙洞之游踪，况夫游子山头，逐臣泽畔；冷泉判事，倥偬余闲，炎徼投荒，凄凉终古。于斯时也，山川登眺，俯仰兴怀，选石留题，以纪鸿爪。”^{[1](P499)}不难想象，这种状态下所作题名记，其记事和写景难免渗透浓厚的个人情感。题名记虽非专为抒情而作，但也不乏以情动人的作品。如苏轼《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虽为应密州通判赵成伯之托而写，但作者也借此而抒胸中磊落牢骚之气：“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

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深中而多数者处。”^{[12](第90册P416)}也有的借此表现时光流逝、人生苦短的感慨，如黄庭坚《海昏题名记》于元祐八年（1093）正月，与朋辈会于海昏县斋，“座客谈仓前樟木乃是数百年木，材木也，而能若是之寿。叹李公择冢上之松已拱，无不慨然”，^{[12](第107册P208)}融含着深沉的人生之叹。南宋冯允之《象耳山题名记》：“先兄之二三友，挟百倍之气，砥砺于此。……朋友雕琢，江山助思，信有益哉！不幸先兄释褐未及，赍恨以游九原。重览旧游，泫然流涕，且感世事荣枯，恍然一梦也。”^{[12](第225册P284)}对兄长的哀悼之情，自然动人。宋代题名记的抒情色彩也影响了后人对这一文体的认识，如明代刘基《浙东肃政廉访司处州分司题名记》：“题名所以识岁月之久近，行役之劳勤，而寓感思于其中焉”，^{[15](P160)}就分明把“寓感思”视作题名的重要特色。

有的题名记借题发挥而说理透彻，如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就是立论明确，论证严密的散文，其中论理财一段尤其精彩：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閭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12](第65册P39)}

王安石的散文，前人称之为“笔力简而健”，“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是何简贵”。^{[16](P556)}这种风格其实不在笔力，而在于其理之透辟，故能以一抵百，虽只下一二语，然因其切中肯綮，自有扛鼎之力，千斤之功。这篇题名记也有类似的特点，上引这段文字不足200字，但从开头就直探本质，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然后用反证法，证明理财之重要，最后用反问凸显善法择吏以理财的主要观点，回应开头，几乎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又如蒲宗孟

《阆州新井县厅题名记》论县令职责之重：

县令比宰相，位不同，其所系同。宰相咸爱其民，不若县令之速。宰相坐中书堂，为天子谋虑天下事，有不至焉，其害即不及于人。天子可否于上，百官诤议于庭，要其是然后行之。令长坐县衙，施设措置，朝行而暮遍，语出而民闻，有一不至，百姓不旋踵被其冤。乡耆里胥莫敢抗也，县吏小吏莫敢争也，将诉于州，辨于转运使，事已老，病已成，力已不胜矣。宰相非其人，以公议可罢；县令不称职，类无大过，不满二年不

去。噫，是亦难矣！^{[12]（第75册P29）}

宰相与县令，品秩相差极大，职责完全不同。此文论县令之重要，偏与宰相相比，极有新意，颇中肯綮，是一篇很有特点的议论性散文。

平心而论，题名与题名记其来有自，并非完全由宋人独创。但不能否认，其独立文体地位的确立和文学成就的获得是在宋代完成的。金代王若虚曾云“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17]（第37卷P11）}题名和题名记中虽然难免“到此一游”式的无聊文字，但亦不乏佳制，从中仍可见宋人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学才华。

注释：

- [1] (清)叶昌炽著，韩锐校注，语石校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 [2] 曾枣庄。宋文通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 梅华。宋代题名记的传承与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2013（6）。
- [4] 王星，王兆鹏。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2013（3）；王晚霞。周敦颐石刻题名考述[J]。成都大学学报，2011（4）。
- [5]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6]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 [7] 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9]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2005。
- [10] 罗福颐。雁塔题名帖介绍[J]。文物，1961（8）。
- [11]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13] 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5] (元末明初)刘基。诚意伯文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6] (清)刘熙载。艺概[C]//王水照。历代文话（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7]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On Autograph and Autograph Prose of Song Dynasty

WANG Xiao-li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What is called autograph refers to the cultural behavior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inscribed the names on the walls and wooden partitions, and the resulting text materials. As an independent style, narrative in autograp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The atmosphere of superscription was popular in Song Dynasty, which produced a special style as “autograph prose”, marking a new climax of the development of autograph. Autographs and autograph prose of Song Dynasty carried more obvious political function,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moral education,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d the literary value which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narration, description, discussion and lyric.

Keywords: autographs; autograph prose; Song Dynasty